

泰和会语

说 明

《泰和会语》,是马一浮先生 1938 年上半年在浙江大学讲学之讲稿。时抗战军兴,先生由杭州避寇南迁至江西泰和,应浙大校长竺可桢礼聘,以大师名义为浙大师生公开讲学。因浙大当时在泰和,故定书名为《泰和会语》。全书主要讲的是“六艺论”。具体内容有:《论治国学先须辨明四点》;《横渠四句教》;《楷定国学名义》;《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》:《论六艺统摄于一心》;《论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》;《举六艺明统类是始条理之事》等篇。被当时学界评为中国文化哲学的代表作。该书版本有 1940 年复性书院刻书处的木刻本, 1964 年台湾广文书局的影印本。

题 识

昔伊川先生每告学者：“汝信取理，莫取我语。见人记其言语，则曰某在焉用此？”盖理是人人所同具，信理则无待于言，凡言皆胜也。言为未信者说，徒取言而不会理，是执指为月。不唯失月，抑且失指。先儒随机施設，不得已而有言，但欲人因言见理而已。岂欲其言之流布哉！若记录之言，失其语脉者，往往有之。自非默识心融，亦鲜能如其分齐。然自孔门以来，答问讲说之辞，并有流传，未之或废。虽曰讽味遗言，不如亲承音旨。然古人往矣，千载之下，犹得因言以窥其志，如见其人，则记录亦何可绝也。人在斯道在，固无事于记言，人不可遇则遇之在言矣。

讲说与著述事异。著述，文辞须有体制，讲说，则称意而谈。随顺时俗，语言欲人易喻，虽入方言俚语不为过。释氏诸古德上堂垂语实近之，其不由记录，出于自撰。古之人有行之者，如象山白鹿书院论语讲义、荆门军皇极讲义、朱子玉山讲义是也。明儒自阳明后，讲会益盛，每有集听，目为会语，其末流寝滥。浮平生杜门，虽亦偶应来机，未尝聚讲。及避寇江西之泰和，始出一时酬问之语。其后逾岭入桂，复留滞宜山，续有称说。皆仓卒为之，触缘而兴，了无次第。始，吾乡王子余见泰和会语，曾以活字本一印于绍兴。吴敬生、曹叔谋、陶赐芝、詹允明，为再印于桂林，旋已散尽。今羁旅嘉州，同处者多故旧。沈无倦、詹允明、何懋楨诸君，及从游之士乌以风、张立民、赖振声、刘公纯诸子，复谋醵资，取泰和宜山会语合两本而锓诸木，且为校字，欲

以貽初机之好问者，刻成而始见告。诸君子之意则善矣。吾之言实不堪流布也。

夫天下之言学者，亦多端矣。此庄生所谓一蚊一虻之劳者也。其于物也，何庸世之览者。或谓其空疏，或斥以诞妄，吾皆不辞，不欲自掩其陋。虽然，使其言而或有一当，则千里之外应之。言虽陋，容亦有可择者存乎其间，苟其不善，则千里之外违之。是亦使吾得闻其过也。故引伊川之言，为题其卷端，以志诸子勤勤之意，且以明吾之措心，故无分于语默也。

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一月马浮识

引 端

今因避难来泰和，得与浙江大学诸君相聚一堂，此为最难得之缘会。竺校长与全校诸君，不以某为迂谬，设此国学讲座，使之参预讲论。其意义在使诸生于吾国固有之学术，得一明瞭之认识，然后可以发扬天赋之知能，不受环境之陷溺，对自己完成人格，对国家社会乃可以担当大事。荀子说：“物来而能应，事至而不惑，谓之大儒。”若能深造有得，自然有此效验。须知吾国文化最古，圣贤最多，先儒所讲明实已详备，但书籍浩博，初学不知所择。又现代著述，往往以私智小慧，轻非古人，不免疑误后学，转增迷惘。故今日所讲，主要之旨趣，但欲为诸生指示一个途径，使诸生知所趋向，不致错了路头，将来方好致力。闻各教授旨言诸生姿质聪颖，极肯用功。此不但是大学最好现象，亦是国家前途最好现象，深为可喜。某虽衰老，甚愿与诸生教学相长，共与

适道。但诸生所习学科繁重，颇少从容涵泳之晷。须知学问是终身以之之事，千里之行，始于跬步。但能立志，远大可期。譬如播种，但有嘉种下地，不失雨露培养，自能发荣滋长。程子说：“天地之间，只是一个感应。有感必有应，所应复为感，其感又有应，如是则无穷。”某今日所言，只患不能感动诸生，不患诸生不能应。若诸生不是漠然听而不闻，则他日必可发生影响。此是某之一种信念，但愿诸生亦当具一种信念。信吾国古先哲道理之博大精微，信自己身心修养之深切而必要，信吾国学术之定可昌明。不独要措我国家民族于磐石之安，且当进而使全人类能相生相养，而不致有争夺相杀之事。具此信念，然后可以讲国学。这便是今日开讲的一个引端，愿诸生谛听。

论治国学先须辨明四点

诸生欲治国学，有几点先须辨明，方能有人。

一、此学不是零碎断片的知识，是有体系的，不可当成杂货。

二、此学不是陈旧呆板的物事，是活鲜鲜的，不可目为骨董。

三、此学不是勉强安排出来的道理，是自然流出的，不可同于机械。

四、此学不是凭藉外缘的产物，是自心本具的，不可视为分外。

由明于第一点，应知道本一贯。故当见其全体，不可守于一曲。

由明于第二点，应知妙用无方。故当温故知新，不可食古不

化。

由明于第三点，应知法象本然。故当如量而说，不可私意造作，穿凿附会。

由明于第四点，应知性德具足。故当向内体究，不可徇物忘己，向外驰求。

横渠四句教

昔张横渠先生有四句诂，今教诸生立志，特为拈出。希望竖起脊梁，猛著精采，依此立志，方能堂堂的做一个人。须知人人有此责任，人人具此力量。切莫自己倭卸，自己菲薄。此便是仁以为己任的榜样，亦即是今日讲学的宗旨，慎勿以为空言而忽视之。

为天地立心

《易大传》曰：“复，其见天地之心乎！”《剥》、《复》是反对卦。䷖《剥》穷于上，是君子道消。䷗《复》反于下，是君子道长。《伊川易传》以为“动而后见天地之心。”天地之心于何见之？于人心一念之善见之。故《礼运》曰：“人者，天地之心也。”《程氏遗书》云：“一日之运，即一岁之运。一人之心，即天地之心。”盖人心之善端，即是天地之正理。善端既复，则刚浸而长。可止于至善，以立人极，便与天地合德。故仁民爱物，便是为天地立心。天地以生物为心，人心以恻隐为本。孟子言四端，首举恻隐。

若无恻隐，便是麻木不仁，漫无感觉，以下羞恶、辞让、是非，俱无从发出来。故天地之大德曰生。人心之全德曰仁。学者之事，莫要于识仁、求仁、好仁、恶不仁，能如此，乃是为天地立心。

为生民立命

儒者立志，须是令天下无一物不得其所，方为圆成。孟子称：“伊尹一夫不获，若己推而纳诸沟中。”横渠《西铭》云：“凡天下之疲癯、残疾、惻独鳏寡，皆吾兄弟之颠连，而无告者也。”此皆明万物一体之义。圣人吉凶，与民同患。未有众人皆忧而己能独乐，众人皆危而己能独安者。万物一体，即是万物同一生命。若人自扼其吭，自残其肢，自刺其腹，而曰吾将以求生，决无是理。孟子曰：“夭寿不贰，修身以俟之，所以立命也。”朱子注云：“立命，谓全其天之所赋，不以人为害之。”又曰：“尽其道而死者，正命也。桎梏死者，非正命也。”今人心陷溺，以人为害天赋，不得全其正命者，有甚于桎梏者矣。仁人视此，若疮痍之在身，疾痛之切肤，不可一日安也。故必思所以出水火而登衽席之道，使得全其正命。孔子曰：“老者安之。朋友信之。少者怀之。”学者立志，合下便当有如此气象。此乃是为生民立命也。

为往圣继绝学

此理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。在圣不增，在凡不减。但因人为气习所拘蔽，不肯理会，便成衰绝。其实，人皆可以为尧舜。颜子曰：“舜何人哉！予何人哉！有为者，亦若是。”学者只是狃于习俗，不知圣贤分上事，即吾性分内事。不肯承当。故有终身读

书,只为见闻所囿。滞在知识边,便谓已足,不知更有向上事。汨没自性,空过一生。孔子曰:“不曰如之何。如之何者,吾未如之何也已矣。苟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,吾未见力不足者。”圣人之言剴切如此,道之不明不行,只由于人之自暴自弃。故学者立志,必当确信圣人可学而至。吾人所禀之性,与圣人元无两般。孟子曰:“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。”心之所同然者,何也?曰理也。义也。濂、洛、关、闽诸儒,深明义理之学,真是直接孔孟,远过汉唐。为往圣继绝学,在横渠绝非夸词。今当人心晦盲否塞,人欲横流之时,必须研究义理,乃可以自拔于流俗,不致戕贼其天性。学者当知,圣学者即是义理之学。切勿以心性为空谈,而自安于卑陋也。

为万世开太平

太平不是幻想的乌托邦,乃是实有是理。如尧之光被四表,格于上下。文王之自西自东,自南自北,无思不服,都是事实。干羽格有苗之顽,不劳兵革。礼让息虞芮之讼,安用制裁。是故不尝而劝,不怒而威,不言而信,无为而成。《中庸》曰:“君子笃恭而天下平。”声色之于以化民未也,圣人至德渊微自然之效,斯乃政治之极轨。自帝降而王,王降而霸,霸降而夷狄,天下治日少而乱日多。秦并六国,二世而亡。晋失其驭,五胡交乱。力其可恃乎?中外历史,诸生闻之熟矣。非无一时强大之国,只如飘风骤雨,不可久长。程子曰:“王者以道治天下。”后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。又曰:“三代而下,只是架漏牵补,过了时日。”孟子曰:“以力假仁者霸,以德行仁者王。以力服人者,非心服也,力不赡也。以德服人者,中心悦而诚服也。从来辨王霸,莫如此言

之深切著明。学者须知，孔孟之言政治，其要只在贵德而不贵力。然孔孟有德无位，其道不行于当时，而其言则可垂法于万世。故横渠不曰致，而曰开者。致是实现之称，开则期待之谓。苟非其人，道不虚行。果能率由斯道，亦必有实现之一日也。从前论治，犹知以汉唐为卑。今日论治，乃惟以欧美为极。从前犹以管商申韩为浅陋，今日乃以孟梭里尼、希特勒为豪杰。以马格斯列宁为圣人，今亦不暇加以评判。诸生但取六经所陈之治道，与今之政论比而观之，则知砒砒不可以为玉，螭螭不可以为龙，其相去何啻霄壤也。中国今方遭夷狄侵陵，举国之人，动心忍性，乃是多难兴邦之会。若曰图存之道，期跂及于现代国家而止，则亦是自己菲薄。今举横渠此言，欲为青年更进一解，养成刚大之资，乃可以济蹇难。须信实有是理，非是姑为鼓舞之言也。

楷定国学名义

国学者六艺之学也

大凡一切学术，皆由思考而起，故曰学原于思。思考所得，必用名言，始能诊表。论是诠释，表是表显。名言即是文字，名是能诊，思是所诊。凡安立一种名言，必使本身所含摄之义理，明白昭晰。

使人能喻，释氏立文身、句身、名身，如是三身，为一切言教必具之体。喻是领会晓了。随其根器差别，而有分齐不同。例如颜子闻一以知十，子贡闻一以知二，之类。

谓之教体。佛说‘此方以音声为教体。’必先喻诸己，而后能喻诸人。因人所已喻，而告之以其所未喻。才明彼，即晓此。因喻甲事，而及乙事。辗转关通，可以助发增长人之思考力，方名为学。故学必读书穷理。书是名言，即是能诊。理是所诊，亦曰格物致知。物

是一切事物之理,知即思考之功。《易·系辞传》曰:“唯深也,故能通天下之志。”换言之,即是于一切事物,表里洞然,更无睽隔,说与他人,亦使各各互相晓了。如是,乃可通天下之志。如是,方名为学。略说学字大意,次说国学名词。

国学这个名词,如今国人已使用惯了。其实不甚适当,照旧时,用国学为名者,即是国立大学之称。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,意思是别于外国学术之谓。此名为依他起。严格说来,本不可用,今为随顺时人语,故暂不改立名目。然即依固有学术为解,所含之义,亦太觉广泛笼统,使人闻之,不知所指为何种学术。照一般时贤所讲,或分为小学文字学经学、诸子学、史学等类,大致依四部立名。然四部之名,本是一种目录。犹今图书馆之图书分类法耳。荀勖《中经》簿本,分甲乙丙丁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始立经史子集之目,至今沿用。其实不妥。今姑不具论,他日别讲。能明学术流别者,惟《庄子·天下篇》、《汉书·艺文志》最有义类,今且不暇远引。即依时贤所举,各有专门,真是皓首不能究其义,毕世不能竟其业。今诸生在大学所习学科甚繁,时间有限,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。现在要讲国学第一,须楷定国学名义。楷定,是义学家释经用字。每下一义,须有法式,谓之楷定。楷即法式之意,犹今哲学家所言范畴。亦可说为领域。故楷定,即是自己定出一个范围。使所言之义,不致凌杂无序,或枝蔓离宗。老子所谓“言有宗,事有君也”。何以不言确定而言楷定?学问,天下之公言。确定,则似不可移易,不许他人更立异义,近于自专。今言楷定,则仁智各见,不妨各人自立范围,疑则一任别参,不能强人以必信也。如吾今言国学是六艺之学,可以该摄其余诸学。他人认为未当,不妨各自为说,与吾所楷定者无碍也。又楷定异于假定。假定者,疑而未定之词,自己尚信不及,姑作如是见解云尔。楷定,则是实见得如此,在自己所立范畴内,更无疑义也。第二,须先读基本书籍。第三,须讲求简要方法。如是,诸生虽在校听讲时间有限,但识得门径不差,知道用力方法不错,将来可以自己研究,各有成就。

今先楷定国学名义，举此一名，该摄诸学，唯六艺足以当之。六艺者，即是诗、书、礼、乐、易、春秋也。此是孔子之教，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。一切学术之原，皆出于此，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。故六艺可以该摄诸学，诸学不能该摄六艺。今楷定国学者，即是六艺之学。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，广大精微，无所不备。某向来欲撰六艺论，郑康成亦有六艺论，今已不传佚文散见群经注疏中，但为断片文字，不能推见其全体，殊为可惜。某今日所欲撰之书，名同实别，不妨各自为例。未成而遭乱，所缀辑先儒旧说，群经大义，俱已散失无存。今欲为诸生广说，恐嫌浩汗，只能举其要略，启示一种途径，使诸生他日可自己求之。且为时间短促，亦不能不约说也。今举《礼记·经解》及《庄子·天下篇》说六艺大旨，明其统类如下。

《经解》引孔子曰：“入其国，其教可知也。其为人也，温柔敦厚，《诗》教也。疏通致远，《书》教也。广博易良，《乐》教也。洁静精微，《易》教也。恭俭庄敬，《礼》教也。属辞比事，《春秋》教也。”

《庄子·天下篇》曰：“《诗》以道志，《书》以道事，《礼》以道行，《乐》以道和，《易》以道阴阳，《春秋》以道名分。”

自来说六艺大旨，莫简于此。有六艺之教，斯有六艺之人。故孔子之言，是以人说。庄子之言，是以道说。《论语》曰：“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”道即六艺之道，人即六艺之人。有得六艺之全者，有得其一二者，所谓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。《论语》记“子所雅言，《诗》、《书》、执礼。”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。《王制》：“乐正崇四术，立四教，顺先王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以造士。春秋教以《礼》、《乐》，冬夏教以《诗》、《书》。”是知四教本周之旧制，孔子特加删订。《易》藏于太卜，《春秋》本鲁史，孔子晚年始加赞述，于是合为六经，亦谓之六艺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云：“及门

之徒三千，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。”旧以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当之，实误。寻上文叙次，孔子删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定《礼》、《乐》，赞《易》，脩《春秋》，自必蒙上而言，六艺即是六经无疑。与《周礼》乡三物所言六艺有别。一是艺能，一是道术。乡三物所名礼，乃指仪容器数。所名乐，乃指铿锵节奏。是习礼乐之事，而非明其本原也。唯六德知仁，圣义中和，实足以配六经。此当别讲。今依《汉书·艺文志》以六艺当六经。经者常也，以道言，谓之经。艺犹树艺，以教言，谓之艺。

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

何以言六艺该摄一切学术？约为二门：一、六艺统诸子；二、六艺统四部。诸子依《汉志》，四部依《隋志》。

一、六艺统诸子

欲知诸子出于六艺，须先明六艺流失。《经解》曰：“《诗》之失，愚；《书》之失，诬；《乐》之失，奢；《易》之失，贼；《礼》之失，烦；《春秋》之失，乱。”学者须知，六艺本无流失；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，俱可适道。其有流失者，习也。心习才有所偏重，便一向往习熟一边去；而于所不习者，便有所遗。高者为贤知之过，下者为愚不肖之不及，遂成流失。佛氏谓之边见，庄子谓之往而不反。此流失所从来，便是学焉而得其习之所近，慎勿误为六艺本体之失，此须料简明白。《汉志》诸子十家，其可观者九家。其实九家之中，举其要者，不过五家，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是已。出于王官之说，不可依据，今所不用。《学记》：“师严，然后道尊。道尊，然后民知敬学。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：当其为尸，则弗臣也；当

其为师，则弗臣也。大学之礼，虽诏于天子，无北面，所以尊师也。”此明官师有别。师之所诏，并非官之所守也。（《周礼》司徒之官，有“师氏掌以嫩诏王”；保氏掌谏王恶”凡“王举则从，听治亦如之”；“师氏使其属率四夷之隶，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门外，且辍。”保氏使其属守王闾”此如后世侍从之官。郑注：‘豕宰以九雨系邦国之民，师以贤得民，儒以道得民，乃以诸侯之师氏、保氏当之。变保为儒，此实于义乖舛。不可从。’《论语》：“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。”又语子夏：“汝为君子儒，毋为小人儒。”此所言师儒岂可以官目之邪。《七略》旧文：“某家者流出于某官”，亦以其言有关政治。换言之，犹曰：“某家者可使为某官。如‘雍也，可使南面’云尔。岂谓如书吏之抱档案邪。如谓道家出于史官，今《老子》五千，是否周之国史。墨家出于清庙之守，今墨书所言，并非筮豆之事。此最易明。吾乡章实斋作《文史通义》，创为六经皆史之说，以六经皆先王政典，守在王官，古无私家著述之例，遂以孔子之业，并属周公，不知孔子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，乃以其道言之。若政典，则三王不同礼，五帝不同乐。且孔子称韶武则明有抑扬，论十世则知其损益，并不专主于从周也。信如章氏之说，则孔子未尝为太卜，不得系《易》未尝为鲁史，亦不得修《春秋》矣。《十翼》之文，广大悉备。太卜专掌卜筮，岂足以知之。笔削之旨，游夏莫赞，亦断非鲁史所能与也。以吏为师，秦之弊法，章氏必为迺护，以为三代之遗，是诚何心？今人言思想自由，犹为合理。秦法，以古非今者族。乃是极端遏制自由思想，极为无道，亦是至愚，经济可以统制，思想云何由汝统制。曾谓三王之治世而有统制思想之事邪。惟《庄子·天下篇》则云：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，某某闻其风而说之。乃是思想自由自然之果。所言道德不一，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，各为其所欲以自为方，道术将为天下裂，乃以不该不遍为病，故庄立道术、方术二名。（非如后世言，方术当方伎也。）是以道术为该遍之称，而方术则为一家之学。谓方术出于道术，胜于九流，出于王官之说，多矣。与其信刘歆，不如信庄子。实斋之论甚卑而专固，亦与公羊家孔子改制之说，同一谬误。且《汉志》出于王官之说，但指九家。其叙六艺，本无此言。实斋乃以六艺亦为王官所守，并非刘歆之意也。略为辨正于此，学者当知。不通六艺，不名为儒。此不待言。墨家统于礼，名法亦统于礼，道家统于《易》。判其得失，分为四句：一得多失多；二得多失少；三得少失多；四得少失少。例如：道家体大，观变最深。故老子得于《易》为多，而流为阴谋，其失亦多，《易》之失，贼也。贼训害《庄子·齐物》好

为无端崖之辞，以天下不可与庄语。得于《乐》之意多为，而不免流荡。亦是得多失多，《乐》之失，奢也。奢是侈大之意。墨子虽非乐，而《兼爱》、《尚同》，实出于乐。《节用》、《尊天》、《明鬼》出于礼，而短丧又与礼悖。《墨经》难读，又兼名家，亦出于《礼》。如墨子之于礼乐，是得少失多也。法家往往兼道家言。如《管子》、《汉志》本在道家。韩非亦有《解老》、《喻老》。自托于道。其于《礼》与《易》，亦是得少失多。余如惠施、公孙龙子之流。虽极其辩，无益于道，可谓得少失少。其得多失少者，独有荀卿。荀本儒家，身通六艺，而言性恶，法后王，是其失也。若诬与乱之失，纵横家兼而有之。然其谈王伯皆游辞，实无所得。故不足判。杂家亦是得少失少。农家与阴阳家，虽出于《礼》与《易》，未流益卑陋无足判。观于五家之得失，可知其学皆统于六艺，而诸子学之名，可不立也。

二、六艺统四部

何以言六艺统四部 今经部立《十三经》、《四书》，而以小学附之。本为未允。六经唯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春秋》是完书，《尚书》今文不完，古文是依托。《仪礼》仅存《士礼》，《周礼》亦缺冬官。《乐经》本无其书。《礼记》是传，不当遗大戴而独取小戴。左氏、公、谷三传，亦不得名经。《尔雅》是释群经名物。唯《孝经》独专经名。其文与《礼记》诸篇相类。《论语》出孔门弟子所记。孟子本与荀子同列儒家，与二戴所采曾子、子思子、公孙尼子七十七子后学之书同科，应在诸子之列。但以其言最醇。故以之配《论语》。然曾子、子思子、公孙尼子之言亦醇，何以不得与孟子并。二戴所记曾子语独多。后人曾辑为《曾子》十篇。《中庸》出子思子，《乐记》出公孙

尼子，并见《礼记正义》，可信。然《礼记》所采七十子后学之书多醇。《大学》不必定为曾子之遗书，必七十子后学所记，则无疑也。二戴兼采秦汉博士之说，则不尽醇，此须料简。今定经部之书为宗经论、释经论二部，皆统于经，则秩然矣。宗经、释经区分，本义学家判佛书名目，然此土与彼土著述，大体实相通，此亦门庭施設，自然成此二例，非是强为差排，诸生勿疑为创见。孔子晚而系《易》，《十翼》之文，便开此二例，《象》、《象》、《文言》、《说卦》是释经，《系传》、《序卦》、《杂卦》是宗经，寻绎可见。六艺之旨，散在《论语》，而总在《孝经》，是为宗经论。孟子及二戴所采曾子、子思子、公孙尼子诸篇，同为宗经论。《仪礼丧服传》，子夏所作，是为释经论。《三传》及《尔雅》，亦同为释经论。《礼记》不尽是传，有宗有释。《说文》附于《尔雅》，本保氏教国子以六书之遗。如是，则经学、小学之名，可不立也。诸子统于六艺，已见前文。其次言史，司马迁作《史记》，自附于《春秋》，《班志》因之。纪传虽由史公所创，实兼用编年之法。多录诏令、奏议，则亦《尚书》之遗意。诸志特详典制，则出于《礼》。如地理志祖《禹贡》，职官志祖《周官》，准此可推，纪事本末，则《左氏》之遗则也。史学巨制，莫如《通典》、《通志》、《通考》，世称三通。然当并《通鉴》计之为四通。编年记事，出于《春秋》；多存论议，出于《尚书》。记典制者出于《礼》。判其失亦有三：曰诬、曰烦、曰乱。知此则知诸史悉统于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，而史学之名，可不立也。

其次言集部。文章体制，流别虽繁，皆统于《诗》、《书》。《汉志》犹知此意。故单出诗赋略，便已摄尽。六朝以有韵为文，无韵为笔；后世复分骈散，并舛陋之见。《诗》以道志，《书》以道事，文章虽极其变，不出此二门。志有浅深，故言有粗妙。事有得失，故言有纯驳。思知言不可不知人，知人又当论其世。故观文章之正变，而治乱之情可见矣。今言文学，统于《诗》者为

多。《诗·大序》曰：“治世之音安以乐，其政和；乱世之音怨以怒，其政乖；亡国之音哀以思，其民困。”三句便将一切文学判尽。

《论语》曰：“诵诗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达，虽多亦奚以为？”可见诗教通于政事。《书》以道事，书教即政事也。故知诗教通于书教。诗教本仁，书教本知。古者教《诗》于南学，教《书》于北学，即表仁知也。《乡饮酒义》曰：向仁背藏，左圣右义。藏即是知。知以藏往，故知是藏义。教《乐》于东学，表圣教《礼》于西学，表义。故知仁圣义，即是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四教也。前以六艺流失判诸子，独遗诗教。《诗》之失愚，唯屈原杜甫足以当之。所谓古之愚也直。六失之中，唯失于愚者不害为仁。故诗教之失最少。后世修辞不立其诚，浮伪夸饰，不本于中心之惻怛，是谓今之愚也诈。以此判古今文学，则取舍可知矣。两汉文章近质，辞赋虽沈博极丽，多以讽谕为主。其得于《诗》、《书》者最多，故后世莫能及。唐以后集部之书充栋。其可存者，一代不过数人。至其流变，不可胜言。今不具讲。但直抉根原，欲使诸生知其体要咸统于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如是则知一切文学，皆诗教、书教之遗，而集部之名可不立也。上来所判，言虽简略，欲使诸生于国学得一明白概念，知六艺总摄一切学术，然后可以讲求。譬如行路，须先有定向。知所向后，循而行之，乃有归趣，不然，则博而寡要，劳而少功。泛泛寻求，真是若涉大海，茫无津涯。吾见有人终身读书，博闻强记，而不得要领，绝无受用，只成得一个书库，不能知类通达，如是又何益哉。复次，当知讲明六艺，不是空言，须求实践。今人日常生活，只是汨没在习气中。不知自己性分内，本自具足一切义理；故六艺之教，不是圣人安排出来，实是性分中本具之理。《记》曰：“天尊地卑，万物散殊，而礼制行矣。流而不息，合同而化，而乐兴焉。”“礼者天地之序，乐者天地之和”。

故曰：“礼乐不可斯须去身。”“仁者见之谓之仁，知者见之谓之知。百姓日用而不知。”自性本具仁智，由不见故日用不知，溺于所习，流为不仁不知。礼乐本自粲然，不可须臾离，由于不肯率由，遂至无序不和。今人亦知人类须求合理的生活，亦曰正常生活。须知六艺之教，即是人类合理的正常生活，不是偏重考古，徒资言说，而于实际生活相远的事。今所举者，真是大辘椎轮，简略而又简略，然祭海先河，言语之序，亦不得不如此。

论六艺统摄于一心

语曰：“举网者，必提其纲。振衣者，必挈其领。”先须识得纲领，然后可及其条目。前讲六艺之教，可以该摄一切学术，这是一个总纲。真是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，曲成万物而不遗。学者须知，六艺本是吾人性分内所具的事，不是圣人旋安排出来。吾人性量本来广大，性德本来具足，故六艺之道，即是此性德中自然流出的，性外无道也。从来说性德者，举一全该则曰仁。开而为二，则为仁知，为仁义。开而为三，则为知仁勇。开而为四，则为仁义礼知。开而为五，则加信而为五常。开而为六，则并知仁圣义中和而为六德。就其真实无妄言之，则曰至诚。就其理之至极言之，则曰至善。故一德可备万行，万行不离一德。知是仁中之有分别者，勇是仁中之有果决者，义是仁中之有断制者，礼是仁中之有节文者。信即实在之谓，圣则通达之称。中则不偏之体，和则顺应之用。皆是吾人自心本具的。心统性情，性是理之存，情是气之发。存谓无乎不在，发则见之流行。理行乎气中，有是气